

中国和尼日利亚的政治经济：比较研究

Ifeyanyi Sunny Odinye, PhD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Nnamdi Azikiwe University, Awka
Email: is.odinye@unizik.edu.ng

摘要

政治和经济学传统上被认为是两个独立的现象，可以分开研究，但在当今世界，它们是相互作用并在决策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两个实体。比较一直是人类所有活动中最基本的活动之一，是我们在生活中做出的每一个选择的内心深处所固有的。本文试图分析现代中国与尼日利亚政治经济的比较。这项工作将评估现代中国和尼日利亚的国家、市场和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启发读者并影响知识。

介绍

政治和经济学传统上被认为是两个独立的现象，可以分开研究，但在当今世界，它们是相互作用并在决策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两个实体。事实上，它们被认为是经济学和政治学的跨学科研究，解释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混合主义和共产主义等政治和经济制度如何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英国经济学家莱昂内尔·罗宾斯 (Lionel Robbins) (1932) 写道：“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行为的科学，将人类行为视为目的与具有替代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的关系。”“如果经济学是对稀缺资源的最佳利用的研究，那么政治经济学则从决策的政治性质开始，并关注政治将如何影响社会中的经济选择。”同样，比较政治制度是比较各国政治制度和文化的最古老的政治分析领域之一。

比较一直是人类所有活动中最基本的活动之一，是我们在生活中做出的每一个选择的内心深处所固有的。无论我们是试图选择在选举中投票给谁或追求什么职业，我们总会有选择，做出明智判断或结论的最有效方法是在它们之间进行比较。政治学家和专家研究过政府和政治过程，但他们从未完全理解它们。只有通过观察跨时间或跨不同社会的制度和过程，他们才能建立背景，以便能够更好地理解并为政治行为制定规则。所以这篇研究论文将要探讨的是中国和尼日利亚的比较政治经济学。

中国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毫无疑问，在二十一世纪独特的全球政治经济形势下，在中国独特的历史政治经济形势下，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是独一无二的。这也是不寻常的，即使在明确的方向上果断地推进以实现明确的目标时，国家在每一步进行实验后都会谨慎行事。经济特区既是这些试验的试验场，也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榜样 (Surendra , 2012)

研究背景

由于其广受赞誉的好处和它为人类社会提供的自由，民主一直保持着其全球知名度。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没有其他治理体系达到同样的受欢迎程度。随着冷战的结束，以美利坚合众国为首的有利于西方的全球政治单极，以及自由正统（以自由市场经济和自由政治意识形态为特征）的逐渐兴起，民主作为一种 Jamo (2013) 将其视为最终的人类政府。这种胜利主义也可以在民主促进发展 (Jamo , 2009 年，

2013 年)和“促进法治、人权、言论自由、行动自由、新闻自由、透明和定期选举进程、多数规则和少数人权利”等等。由于民主基于规则而非个人,因此它被视为唯一能够完全遵守有关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国际条约的政府类型 (Imhonopi, 2012 年)。

于是,尼日利亚人民以胜利的姿态欢迎 1999 年 5 月恢复民主,希望早日实现国家改革的长期目标。然而,自 1999 年以来,尼日利亚民主政治经历了 16 年不间断的时期,民主政府的绩效记分卡引发了对该国长期生存能力的担忧。该国的民主政治非但没有改写尼日利亚惨淡的发展故事,反而变成了一场可笑的马戏团,丰富了该国本土的贵族和富豪势力,以及他们的国际支持者。此外,尼日利亚的民主政治并没有阻止该国陷入解体、基础设施危机和人力资本不发达的境地,而是成功地巩固了铁寡头政治、财阀统治、官员腐败、压制民意、种族多样性政治化和建立一个只惠及少数人利益的昂贵治理项目 (Imhonopi, 2011)。

因此,非洲国家作为第四大民主国家,人口一点点向一亿九千万人逼近,因此世界第六大石油大国,充满了治理危机,动摇了发展机械现象,阻碍了人类发展。指数 (Jamo, 2013; Worldometers, 2016)。值得注意的是,在不稳定的诱惑下,如果选民人数膨胀,这种高州信天翁仍然是全国性的祸害。因此,许多尼日利亚人的社会经济条件的不稳定使他们容易受到不受控制的新法西斯主义愿景或疯狂的福音派信息 (Standing, 2012) 或国家内部的冲突或反动利益的影响,这些利益有可能将他们变成国内的死亡天使社会 (Imhonopi, 2015)。

另一方面,被一些人斥为“有缺陷”或“伪”或意识形态的中国政治模式或民主制度为中国人民带来了良好的社会和经济红利。尽管对中国的治理模式提出了一连串的批评,但它仍然巧妙地使 600 和 500 万选民摆脱了压迫性的经济状况,并将中国带入了工业国家联盟。这是通过一种看似本土的中国政治模式实现的,这种模式支持了政治精英制度和乡村或社区民主制度 (Imhonopi, 2016 年)。

问题陈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 (PRC) 在非洲的存在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方面已显着加强。一方面,中国应该将能源资源和原材料证券化,并寻求客户市场的多元化/扩张。另一方面,大部分非洲国家正在摆脱旷日持久的公开和内部武装冲突,努力进行社会和经济监管。

尼日利亚可能是一个资源丰富的国家,人口年轻且不断增长。非洲国家具有增长潜力,但想要一个像中国这样的乡村,其经济、政治和外交目标与为发展提供投资相同。另一方面,中国可能是一个充满活力和不断上升的经济体,已经赢得了经济独立和增长。中国能够向非洲国家提供低息贷款、双边贸易政策和经济援助 (技术和人道主义)。因此,本研究试图检验时尚的中国和非洲国家的经济科学。

尼日利亚目前存在的民主政治是不可持续的、不可行的、不代表人民的,而且代价高昂。为了保持恢复文官统治所取得的成果,并防止那些发出反社会暴力警报的人掠夺与民主制度越界的愤怒的绝大多数人,政府必须更多地与真正的主权人民联系起来尼日利亚的民主,必须致力于满足他们的福利和需求 (Imhonopi, 2016)。重要的是,中国的成就展示了富有远见的领导力量、灵活的本土政治模式的存在

以及统治阶级改变其人民命运的政治决心。尼日利亚可能会从中国拯救国家从迫在眉睫的灾难中获得的奇迹中学到很多东西。

文献综述

对现代中国和尼日利亚的政治经济学比较进行了多种研究。两国的学习者都从这些研究中受益。在本章中，研究人员将评估以往关于比较尼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这是两国政治经济学的一个特点。

政治经济学概论

在社会学和政治话语中，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并不新鲜。政治经济学是 18 世纪用来研究经济或政治状况的短语。如果经济学是最大限度地利用有限资源的科学，那么政治经济学则始于决策的政治特征，并以政治如何影响社会中的经济选择为中心。另一方面，社会不仅包括国家或其他司法管辖区，还包括社会团体、企业和其他组织 (Lumanyano, 2018 年)。

在政治学中，文学政治被定义为权力和权威的科学，以及权力和权威的表现。因此，就个人（国家元首、亿万富翁等）或团体（跨国公司）实现反映其目标的结果的能力而言，权力会影响政治经济学。

今天，政治经济学可以指代多种事物，包括马克思主义分析、芝加哥学派和弗吉尼亚学派的公共选择方法，或者仅仅是经济学家对政府或公众就一般经济政策或具体建议提出的建议（其中它不用作经济学的同义词）(Groonwegen, 2008 年)。

根据 Maier (2008) 的说法，一种政治经济学方法询问经济意识形态以揭示其社会学和政治前提。简而言之，它将经济概念和行为视为必须解释的信念和行为，而不是研究的框架。政治与经济的联系被认为是政治经济学的重点。因此，它关注经济政策与实施这些政策的社会和政治框架之间的联系。由 Eboh (1999) 定义的政治经济学是一门方法兼学科，侧重于市场和政府的组织，以及经济主体、政策制定者、公共雇员和整个社会的激励、人才和行为。

根据 Bohon (2003) 的说法，政治经济学“探索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分配和消费，包括国家在这些过程中的作用。”它侧重于塑造经济产出、资源分配和政府行为的社会背景，其特征通常是阶级、民族-种族身份、性别和国家的结构性不平等。重要的是要记住，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对其经济和社会动态至关重要。

根据 Aregbeshola (2011) 的观点，虽然政治和政治过程不一定会产生人们的社会结构，但这种存在的制度框架、过程和结果确实会影响国家和人民社会经济地位的路径和结果。根据 Henderson (2015) 的说法，政治经济学要求个人具有批判性，并以一种不简单或宣传的方式来理解世界。从本质上讲，政治经济学提供了对形成所有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基础的更批判性的知识。结果，提供了比主流策略更细致入微的观点，主流策略显然让大多数人在少数人的要求下失败了

政治经济学比较研究著作

根据 Utomi (2007) 的说法, 两国的贸易联系在过去十年中已经从极少和不频繁的沟通演变为更复杂的企业关系 (Utomi, 2007)。另一方面, 尼日利亚与中国的贸易逆差是由于中国商品的进口量大于尼日利亚对中国的出口量。除非尼日利亚能够以更高的质量和有竞争力的成本增加其本土选择, 否则当前的现实表明贸易逆差将会增加。根据 UNCTAD 的数据, 2012 年至 2017 年间, 从非洲向中国转移的产品是采掘资源。2002 年至 2013 年间, 燃料和石油分别占对华出口总额的 62% 和 60% (Pigato 和 Tang, 2015 年)。天然和未加工产品占对华出口总额的 96% 以上。从 2012 年到 2017 年, 中国制成品进口约占进口总额的 94.6%, 造成每年近 195 亿美元的贸易逆差 (UNCTAD, 2018)。

然而, 一些学者质疑中国对非洲的关注, 也就是对尼日利亚的关注。根据奥尔登 (2005) 的说法, 中国与尼日利亚关系的主要目标是获得非洲未开发的原材料, 特别是在尼日利亚。2002 年至 2013 年间, 燃料和石油分别占对华出口总额的 62% 和 60% (Pigato 和 Tang, 2015 年)。天然和未加工产品占对华出口总额的 96% 以上。从 2012 年到 2017 年, 中国制成品进口约占进口总额的 94.6%, 造成每年近 195 亿美元的贸易逆差 (UNCTAD, 2018)。

此外, Alden (2005) 认为, 中国与尼日利亚关系的主要目标是获得非洲未开发的原材料, 特别是在尼日利亚。尼中关系具有多个方面的特点, 包括援助、移民项目、中国投资和基础设施贷款, 所有这些都使中国与尼日利亚的关系与众不同。

然而, Sautman and Hairong (2007) 和 Ramos (2004) 的主要影响是中国政府对地方政治的态度、不干涉政策以及对基础设施支出的重视。

根据文平 (2007) 的说法, 问题是与主权、国际关系、建立共识和解决问题相关的中国价值观。根据 Sautman 和 Hairong (2007 年) 的说法, 中国对尼日利亚经济困难的态度与华盛顿对民主、善政和减贫的新自由主义态度形成鲜明对比。Zafar (2007) 指出, 中国的投资方式可以帮助非洲的经济增长和发展, 因为所有投资和基础设施贷款都“不附带任何条件”。然而, Brautigam (2003) 指出, 中国的大部分贷款是长期的、接近零利率的贷款。Taylor (2006), 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投资在过去十年中超过了 1000 亿美元的门槛。泰勒的理论也促使学者们研究尼中贸易关系及其对国家社会经济的影响 (Alden, 2006; De Lorenzo, 2007)。

尽管在 Alden (2005 年) 看来, 尼日利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大多数中国赞助项目都被指控雇用中国员工而不是当地人。《经济学人》(2018 年) 声称在非洲有 264,000 名中国雇员, 高于 2011 年的 81,000 名, 这一说法得到了支持。据信有数百万的非正规移民未包括在估计中 (经济学人, 2018 年)。不仅如此, 中国市场对非洲企业和出口的影响也被描述为“令人讨厌” (De Lorenzo, 2007 年)。这在尼日利亚的纺织业很明显, 中国产品迫使当地工厂关闭 (De Lorenzo, 2007 年)。

不仅如此, Anshan (2007) 声称尼中关系正在导致大量失业。他表示, 在尼日利亚, 当地的劳动法律和规范与一些中国企业使用的不道德劳动做法之间存在冲突。由于大公司因无力与入侵尼日利亚市场的中国企业竞争而倒闭, 许多员工正在失去工作。

因此，中国企业没有为当地经济增长或就业率做出贡献。此外，中国商品的质量存在争议，中国商品的质量被认为因进口商的规格而异，但可能比国内制造的商品质量更高，价格更高（鞍山，2007年）。此外，有人认为尼中贸易关系引发了道德困境。茨威格和建海（2005）也指出，中国企业与东道国有着暴力关系的历史，如苏丹、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和赞比亚所示。例如，赞比亚谦比希铜带的抗议劳工被中国监督人员用子弹射杀（Trofimov，2007年）。

一些学者对中尼经贸关系持中立立场。Agbebi 和 Virtanen（2017年）以及 Mlambo 等人（2016年）等学者认为这种关系对非洲来说更多的是机会而不是威胁。专家们说，应该调查这种联系的潜在前景，特别是作为对我们大量自然资源制造产品贸易逆差的反应。据研究人员称，最好的方法之一是利用经济加工区（EPZ）吸引中国企业来尼日利亚生产（Stein，2012年）。学者们认为，这将有助于尼日利亚向工业化迈进。然而，Harry（2016，2018）发现，尼日利亚出口加工区管理局（NEPZA）建立的出口加工区仅对尼日利亚的非石油出口贡献了4%。此外，只有29%的投入来自当地原材料，只有46%的管理人员是尼日利亚国民。

尼日利亚和中国政治经济

这项研究采用比较方法，严重依赖书籍、期刊、杂志和其他可靠来源的二手数据。该研究特别关注并依赖联合国出版物、尼日利亚统计局发布的文献、尼日利亚中央银行公报以及其他中国作者的资料。

尼日利亚民主政治

本研究借鉴了 Ajayi 和 Ojo（2014年）在描述尼日利亚民主政治时的意识形态三重奏，他们将其视为（1）一个挥霍无度的制度，该国的民主品牌花费如此之少；（2）崇尚官场、投资和保障掌权者，同时贬低真正掌握政治权力的人民的民主品牌。因此，尼日利亚的民主政治可以被描述为精英主义、资产阶级和代价高昂的。

在对国家民主结构及其运作者的昂贵管理中，民主政治一直是可耻的。根据 Imhonopi 和 Urim（2012年）的说法，尼日利亚民主政治的特点是根深蒂固的拜占庭式腐败，从中心延伸到组成州和地方政府。政府部委、部门和机构（MDA）的增多、臃肿、不合格和受损的公务员制度、行政和立法部门的盗窃补偿方案以及一连串未完成的项目和大规模基础设施危机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情况。公款管理不善。

根据 Adeseko（2015年）的说法，买票、勒索和不正当交易是该国各种民主结构的典型特征，他注意到政治腐败、勒索和金融恶作剧是政府行政、立法和司法部门的典型代表。民主选举的代价与此密不可分。并不是说选举是全世界廉价的民主活动（Champion News，2014年），而是尼日利亚政治精英的行事方式有时是敲诈甚至是暴力的。政治教子并没有为表面上选举这些官员上任的人民服务，而是将他们教父的利益和要求置于人民的利益和要求之上。在尼日利亚政治中，这导致了政治教父主义的增长，以及它的所有缺陷和绝望。

此外，尼日利亚的选举政治似乎有利于出价最高的人，即那些拥有巨额资金或政治企业家的人进入政界是为了服务而不是为人民服务 (Daniel, 2015 和 Lawal, 2015)。因此，尼日利亚的政治参与似乎有利于贵族、富豪或统治阶级，这反映或呼应了马克思的论点，即统治经济领域的人也会影响包括政治在内的其他社会生活领域。

此外，尼日利亚的选举政治似乎有利于出价最高的人，即那些拥有巨额资金或政治企业家的人进入政界是为了服务而不是为人民服务 (Daniel, 2015 和 Lawal, 2015)。结果，尼日利亚的政治参与似乎有利于贵族或统治阶级，反映或呼应马克思的论点，即统治经济领域的人也会影响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包括政治。布哈里政府已努力减少尼日利亚的 MDA 和部委的数量。古德勒克·乔纳森总统的前任政府有 24 个部委和 42 名部长，但新政府通过向参议院发送 36 名部长提名人，表明了减少内阁部长人数的决心 (Nda-Isaiah, 2015 年)。

根据 Ajayi 和 Ojo (2014 年) 的说法，尼日利亚民主的特点还在于“为了一些尼日利亚人的舒适而将公共资金挥霍得令人难以置信且不可原谅”。正如 Ajayi 和 Ojo 所描述的，这种“浪费民主”将民选官员的舒适和安全置于公众需求之上 (Imhonopi, Urim 和 Kasumu, 2014 年)。

中国政治模式

中国的社会民主建立在两大支柱之上：精英政治，中国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由政治局（中国的执行和决策委员会）提名；农村民主，中国人民有更大的发言权。在 1980 年代后期，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打击地方官员的腐败，中国实行了村级选举 (Bell, 2015 年)。2008 年，超过 9 亿中国村民利用他们的权利投票给他们最喜欢的地方立法者正如 Bell (2015) 所观察到的，这些选举的进行通常是自由和公平的，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改善。

中国的贤能政治是其政治模式的另一条腿，它提倡国家的高层职位应该建立在选拔有能力和美德的候选人的基础上。这种领导选拔制度在中华帝国通过可追溯到 6 世纪和 7 世纪隋朝的精心考究制度化 (贝尔, 2015 年)。这些考试在 1905 年被废除，标志着帝国制度的终结，但在过去的三个十年里又恢复了。在大多数情况下，有抱负的政府官员必须通过公共服务考试，这是一种类似智商的评估，带有一些意识形态内容，每个入门级职位都有成千上万的申请人争夺 (Imhonopi, 2016)。为了提升政治指挥链，申请人或有抱负的人必须在较低级别的政府中表现良好，每一步都有更严格的评估。高层管理人员还必须拥有数十年的多元化行政经验，只有一小部分达到政府最高级别。习近平的四个十年的主席生涯，包括 16 次重大晋升，通过县、市、省、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最高职位，每个阶段都进行审查，以评估他的领导能力和在他被选中担任崇高职位之前的美德 (贝尔, 2015 年)。另一份报告称，在成为总统之前，习近平领导的地区总人口为 1.5 亿，总 GDP 为 1.5 万亿美元 (“美国民主吗”，2015 年)。

据支持地方民主选举的中国政府称，人们对他们选出的领导人的能力和美德进行了更好的教育，政策更加直截了当，社区意识更容易形成，错误的代价也更低。同样，政府可以在地方一级试验经济和社会改革计划，其结果决定了这些计划是否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复制。中国灵活的宪法框架不要求各级政府之间严格分权，有助于这一进程 (贝尔, 2015 年)。此外，中国的贤能政治维持成本非常低，它允许该国建立一个领导管道，从中选择其领导人。

党的高级领导机构政治局受命任命谁将担任国家主席，任期十年，将中共定位为中国利益的代表和选举团的一种形式。因此，中国的政治制度被广泛认为是当今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甚至比真正的民主国家还要激烈。它的一党制被认为是适应性强、任人唯贤、合法的，具有自我纠正的政治范式。正如一位华裔美国人所说：

“在最近的记忆中，党的政策范围比任何其他国家都要广泛，从激进的土地集体化到大跃进，再到耕地私有化，再到文革，再到邓小平的市场改革，再到继任者江泽民向私人商人开放党籍的巨大政治步骤，这在毛泽东统治时期是不可想象的。”结果，党以戏剧性的方式自我纠正。为了纠正早期的功能障碍，在机构层面实施了新的规定。例如，期限限制。政治领导人过去能够终身保住工作，这使他们能够集权并维持他们的法规。尽管毛泽东是现代中国之父，但他的长期统治导致了致命的错误。因此，该党制定了任期限制和 68 至 70 岁的规定退休年龄（“Is American Democracy”，2015 年）。

尽管中国的政治模式可能无法与主流民主正统观念相适应，但中国的一党制社会民主主义证明了中国人民坚定不移地发展自己的政府制度的决心，这与他们独特的社会文化模因和政治传统相一致，并根据不断变化的情况继续调整这个意识形态的玩意儿。尽管中国的政治模式在媒体审查、选举民主仅限于地方政治空间、宪政法治薄弱、中央集权少放权、腐败错综复杂等方面存在缺陷，但体制已经产生了现在被称为经济奇迹（“美国民主是奇迹吗？”）（Morrison，2014 年）。

从 1979 年（首次实施经济改革）到 2013 年，中国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以每年近 10% 的速度增长（Morrison，2014 年）。作为全球经济力量，中国同样崛起。它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商、商品出口商和外汇储备持有者。中国也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一些观察家认为它可能在未来几年超过美国。中国惊人的经济增长引发了关于“中国崛起”的各种讨论，北京的座右铭“中国和平崛起”强调了这一理念（莫里森，2014 年）。

除了劳动力规模和国家生产力在中国经济转型中发挥的作用外，富有远见的领导力、审慎的资源管理、快速的基础设施发展、教育体系的发展、促进有利和得到良好支持的中小企业环境以及积极进取的工业政策都归功于中国的经济实力。中国政府在经济变革方面的成功也可以归功于其执政方式。

尼日利亚和中国政治经济

国际体系由许多国家组成，这些国家在全球舞台上追求自己的国家利益，同时考虑到它们从这种互动中获得的优势（Ampiah，2015）。中国在非洲的经济利益迅速扩大，这是上述持久的全球联系的一部分，是非洲大陆外交政策领域的一个重要趋势。由于其在非洲大陆的重大投资，其中大部分得到中国可投资出口信贷援助的支持，为主要跨国公司提供了 1500 亿美元的支持，中国自 2010 年以来已超过美国成为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Brautigam，2009 年）。2001 年至 2011 年间，中国对非洲的出口从 44 亿美元增加到 563 亿美元。尽管中国仍被列为第三世界国家，但它拥有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多年来，中国通过商业、援助和投资与尼日利亚保持联系，而尼日利亚也关注中国的经济前景。中尼关系也建立在探索经济比较优势、互利共赢的基础上。中国的发展中经济需要尼日利亚提供更多的原材料资

源，特别是原油，以推动其工业发展，因此中尼贸易扩大。中国还利用尼日利亚庞大的人口（据信约为 1.5 亿）（尼日利亚人口普查，2006 年）为中国制成品创造域外市场。由于尼日利亚人口众多、自然资源丰富，中国在尼日利亚的投资已成为二十一世纪的热门话题，目前有 200 多家中国公司在该国开展业务，使尼日利亚成为中国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最大接受国—中国在非洲的 265 亿美元中约有 150 亿美元。

尽管尼日利亚和中国之间存在职能关系，但学者和专家对两国社会经济合作的好处表达了不同的观点，中国在尼日利亚的投资引起了敌意和批评。本节倾向于比较中国和尼日利亚的政治经济。

不可否认，中国经济与美国等其他大型经济体一样，对全球其他地区产生了影响（Fan et al., 2009）。由于中国对世界其他地区，特别是非洲的影响，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人都对其经济扩张感到担忧。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因此，中国必须确保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保持稳定（Perkins & Rawski, 2008）。不管对中国经济以及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关系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不可否认的是，它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全球增长和影响的国家（Gbadamosi & Oniku, 2009 年）。

中国经济的兴衰，被世界银行评为购买力平价（PPP）最高的国家，在名义 GDP 方面仅次于美国，可能会对其他国家产生重大影响，尤其是那些依赖进口货物或出口货物的人。作为重要的制造业强国，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主要制成品供应商。由于经济放缓将对尼日利亚等国家产生重大影响，这些国家依赖廉价的中国进口产品作为其制成品的主要来源和最大的燃料客户之一，因此开展了一些研究来评估中国近期经济高速增长的可持续性。自 1970 年代经济改革以来的几十年（Wu, 2000）。

人们已经对中国经济的长期生存能力感到担忧，特别是考虑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估计，该估计将中国的年 GDP 增长率降至 6.2%。做出这一决定是因为中美贸易争端的结果存在不确定性，这可能会对中方施加限制。中国的劳动力是另一个不确定性来源，因为人们担心提高工资以满足全球标准的压力（Zheng & Liu, 2009）以及劳动力老龄化不可避免的影响可能会阻碍经济增长。

中国的经济实力和潜力可能会对非洲产生广泛的影响，包括经济、军事、外交甚至能源（Waldron, 2008 年）。埃及、尼日利亚、尼日尔、安哥拉、非洲之角、赞比亚、津巴布韦、苏丹和南非是沃尔德伦在考察中国对非洲的影响时提到的国家。尼日利亚入选名单，结合其人口、自然资源（原材料）禀赋和增长潜力，意味着如果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得到充分发挥，后果将是相当可观的；无论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

如果中国经济继续以目前的速度增长，增长可能不仅会影响中国人民的生计，还会影响其同胞的生计（Bai, et al., 2012）。中国的盟友，如尼日利亚等著名的非洲国家，将从中国的经济扩张中获益，因为中国将有更多资金投资于他们的发展。从经济能力的角度考虑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商业联系也很重要，因为如果中国没有当前水平的可消费收入，它就不会参与非洲国家的事务。在最基本的层面上，像尼日利亚这样的国家只是中国经济持续快速扩张的受益者。

尼日利亚的经济故事，作为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随着时间的推移，反应不一，在取得进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令人不快的错误。尼日利亚拥有庞大的经济体，占该地区 GDP 的 41%，是非洲第三大经济体，仅次于南非和埃及（Babajide 等人，2015 年）。暴政的威胁和随后的国际孤立是尼日利亚后独立时代经济进步的主要挫折，导致该国经济下滑（Lewis，1999）。这个资源丰富的国家没有利用资源来扩大经济，而是专注于解决无休止的问题。另一方面，尼日利亚在经济增长方面重新进入国际社会，从而唤醒了沉睡的经济庞然大物。尼日利亚仍在遭受政治动荡的影响，直到最近，其经济长期处于瘫痪状态。该国经济的复苏需要从合作和国际联系开始，特别是通过商业。中国是最早相信尼日利亚重建进程的局外人之

一。

这个资源丰富的国家没有利用资源来扩大经济，而是专注于解决无休止的问题。另一方面，尼日利亚在经济增长方面重新进入国际社会，从而唤醒了沉睡的经济庞然大物。尼日利亚仍在遭受政治动荡的影响，直到最近，其经济长期处于瘫痪状态。该国经济的复苏需要从合作和国际联系开始，特别是通过商业。中国是最早相信尼日利亚重建进程的局外人之一。

由于努力避免暴力和注重经济复兴，尼日利亚的经济增长在 2010 年之后的前五年保持高度稳定和舒适的高增长。这段时期的 GDP 年均增长率达到了惊人的 7%，目前是西非最大的经济体，贡献了非洲大陆 GDP 的 14%（Babajide 等人，2015 年）。与购买力平价排名第一的中国相比。

尼日利亚排名世界第 31 位。在资源方面，尼日利亚是中国最关心的问题，石油资源丰富，桶产量（360 亿桶）居世界第八位。除石油外，尼日利亚还拥有天然气等额外资源（Usman，2010 年）。乌斯曼估计尼日利亚的天然气储量至少有 100 万亿立方英尺，据数据显示，尼日利亚的天然气产量位居世界第六。尼日利亚还富含其他矿物，迄今为止，该国已发现大约 34 种固体矿物。

尼日利亚 80% 的预算收入来自石油销售，占该国外汇收入的至少 95%。另一方面，由于其财富，尼日利亚是其 1.68 亿居民中资源（收入）分配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根据 Awe & Olawumi（2012），不到 10% 的人口拥有该国一半以上的资源。

凭借尼日利亚的财富以及为维护和平和避免长期占据该国的政治冲突所做的努力，过去几个西方和东方国家已经寻求具有不同利益的商业伙伴关系。鉴于其目前的经济重要性，中国似乎是在许多人希望与非洲经济强国举行的经济婚礼中获得尼日利亚手中的快乐追求者之一。鉴于非洲提供了中国 77% 的石油、13% 的金属、2% 的木材、3% 的棉花以及另外 35% 的梨和中国经济中使用的其他宝石（Gbadamosi 和 Oniku，2009 年），很容易看出为什么尼日利亚比其他非洲国家更有机会与中国建立经济伙伴关系。中国在独立后时代通过开放政策赢得了尼日利亚的信任，当时许多国家都不想与这个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建立联系。由于尼日利亚人口众多，制造能力有限，因此需要在中国以低成本大量生产一些物品，近年来两国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事实上，中国从这种关系中受益最大，因为它利用贸易协定获得了尼日利亚丰富的宝贵石油和天然气。

发现

这项研究的结果表明，现代中国和尼日利亚的政治经济学存在差异。这项研究的结果与 Adewole (2018) 一致，即尼日利亚和中国从外交关系中受益，但这种关系并不互惠互利，而是向中国倾斜。两国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增加了尼日利亚经济对中国的依赖，损害了其经济安全。研究结果也与 Shiitu (2018 年) 一致，即中国是快速社会经济转型的全球模式，尼日利亚可以对其进行研究，以提高其经济的最佳绩效。

凭借尼日利亚的财富以及为维护和平和避免长期占据该国的政治冲突所做的努力，过去几个西方和东方国家已经寻求具有不同利益的商业伙伴关系。鉴于其目前的经济重要性，中国似乎是在许多人希望与非洲经济强国举行的经济婚礼中获得尼日利亚手中的快乐追求者之一。鉴于非洲提供了中国 77% 的石油、13% 的金属、2% 的木材、3% 的棉花以及另外 35% 的梨和中国经济中使用的其他宝石 (Gbadamosi 和 Oniku, 2009 年)，很容易看出为什么尼日利亚比其他非洲国家更有机会与中国建立经济伙伴关系。中国在独立后时代通过开放政策赢得了尼日利亚的信任，当时许多国家都不想与这个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建立联系。由于尼日利亚人口众多，制造能力有限，因此需要在中国以低成本大量生产一些物品，近年来两国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事实上，中国从这种关系中受益最大，因为它利用贸易协定获得了尼日利亚丰富的宝贵石油和天然气。

发现

这项研究的结果表明，现代中国和尼日利亚的政治经济学存在差异。这项研究的结果与 Adewole (2018) 一致，即尼日利亚和中国从外交关系中受益，但这种关系并不互惠互利，而是向中国倾斜。两国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增加了尼日利亚经济对中国的依赖，损害了其经济安全。研究结果也与 Shiitu (2018 年) 一致，即中国是快速社会经济转型的全球模式，尼日利亚可以对其进行研究，以提高其经济的最佳绩效。

参考

- Agbebi, M., & Virtanen, P. (2017). 依附理论—理解中国在非洲存在的概念镜头？发展研究论坛, 44(3), 429-451.
- 奥尔登, C. (2005 年)。中国和非洲。生存, 47(3), 147-164.
- Alden, C. 和 Davies, M. (2006)。中国跨国公司在非洲的经营概况。南非国际事务杂志, 13(1), 83-96.
- 鞍山, L. (2007)。中国和非洲：政策和挑战。中国安全, 3(3), 69-93.
- Awe, A. A., Olawumi, O. R. (2012), 尼日利亚经济收入分配的决定因素：1997 - 2005, 国际商业与管理, 15(1), 126-137.
- Adamu, A. (2017 年) “尼日利亚从中国获得 75 亿美元的铁路项目贷款”, Amaechi Premium Times, 2 月 6 日, https://www.premiumtimesng.com/news/headlines/222767-update-nigeria-secures-75-50-亿贷款中国铁路项目_amaechi.html.
- Akongbowa, B. A. (2008)。尼中经济合作：概念、争论的问题和前景及其对西非次区域的影响。第 12 届 EADI 大会，全球可持续发展治理，日内瓦 24-28，第 9 页

- Alli, W. O. (2007)。与中国交往的前景和挑战。拉各斯：NIIA。
- Alobo O.J, (2014) 尼日利亚-中国贸易关系和尼日利亚经济发展, 2001-2013 提交给尼日利亚大学 Nsukka 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的研究项目, 部分满足获奖要求国际关系理学硕士学位 (M.Sc.)
- Adeseko, D. (2015)。尼日利亚民主：有多贵？取自 <http://www.mynewswatchtimesng.com/nigerian-democracy-expensive/>
- Ajayi, A. T. & Ojo, E. O. (2014)。尼日利亚的民主：实践、问题和前景。发展中国家研究, 第 4 卷, 第 2 期, 107-125。
- Ampiah, Kweku 和 Sanusha Naidu. 2008. 《卧虎藏龙？：非洲与中国》, 12-17。开普敦：夸祖鲁-纳塔尔大学出版社。
- Babajide, A. A., Adegboye, F. B. 和 Omankhanlen, A. E (2015) 尼日利亚的金融包容性和经济增长, 国际经济和金融问题杂志, 5(3), 629 - 637。
- Bai, C. E., Ma, H., & Pan, W. (2012)。中国的空间溢出效应与区域经济增长, 中国经济评论, 23(4), 982-990。
- Brautigam, D. (2003)。近距离接触：中国商业网络作为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工业催化剂。非洲事务, 102, 447-467。
- Bohon, S., Dahms, H.F., Dandaneau, S. P., Freu, R.S., Gellert, P. Jalata, A. & Shefner, J. (2003)。政治经济。田纳西州：田纳西大学文理学院；社会学的发展。
- Brautigam, D. 和 T. Xiaoyang (2013) “集体走出去”：结构转型和中国的海外经济特区”, 世界发展 63: 78-91。
- 贝尔, D. A. (2015)。中国民主并非不可避免。大西洋组织。取自 <http://www.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archive/2015/05/chinese-democracy-isnt-inevitable/394325/>
- 冠军新闻。(2014年11月20日)。在任何地方实践民主都是昂贵的——恩泽里贝。取自 <http://www.championnews.com.ng/democracy-is-expensive-to-practice-anywhere-nzeribe-2/>
- Chika O. (2019)。中国在尼日利亚石油部门投资 160 亿美元。 https://www.voanews.com/a/africa_china-invests-16-billion-nigerias-oil-sector/6174771.html
- 陈, Y. Sun, I. Y. Ukaejiofo Y., Xiaoyang, T. 和 Brautigam, D. (2016)。向中国学习？尼日利亚的制造、投资和技术转让。SAISCRI, 工作文件 2, 1 月。
- 丹尼尔, I.U. (2015)。尼日利亚的政治参与和民主文化：以尼日利亚为例。人文与社会科学杂志 10 (1): 32-39。
- 戴维斯, 马丁。(2008年)。《经济特区：中国发展模式走进非洲》。In *China into Africa Trade and Influence*, Rotberg, Berga, 137-145 Maryland: Brooking Institute Press 主编。
- 德洛伦佐, M. (2007年)。非洲对中国的看法。美国企业公共政策研究所。
- Gbadamosi, A. 和 Oniku, A. C. (2009年6月)。中国与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经济协定的战略意义；尼日利亚的情况。在国际艺术与科学杂志会议上 (第 1 卷, 第 18 期, 第 (115 - 130) 页)。

- Gimba Z. 和警长 G.I. (2018 年)。中尼经济关系：需要加强资源管理以促进发展。国际科学研究与发展趋势杂志 (IJTSRD)。 2 (3)。
- 刘易斯, P. (1999)。尼日利亚的经济；机遇和挑战。非洲问题, 27 (1), 50 -53。
- Perkins, D. H. 和 Rawski, T. G. (2008)。预测中国到 2025 年的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大转型, 826-860。
- Agbu, O. (1994), “促进尼中关系”, 尼日利亚论坛, 卷。 14, 第 11 至 12 号, 11 月至 12 月。
- Chibundu, V. N. (2000), 尼日利亚 - 中国对外关系, 1960 - 1999, 伊巴丹: Spectrum Books Limited。
- Ezirim, G. E. (2007 年), “对中国 - 在 - 非洲辩论的反思：重商主义、伙伴关系还是霸权复兴?”, 国际政治与发展研究杂志, 卷。 3, 第 1 期, 7 月/12 月。
- 哈里, D. (2016 年)。 2001-2013 年尼日利亚出口加工区和经济多元化。政治学与领导研究杂志, 2 (2)。
- 哈里, D. (2018 年)。尼日利亚出口加工区的增值政策：亚洲经济体的经验教训。地中海社会科学杂志, 9 (3)。
- Imhonopi, D. & Urim, U. M. (2011)。全球气候变化对尼日利亚不断发展的民主的影响。人文、社会科学和创意艺术杂志, 卷。 6、1、110-123。
- Imhonopi, D. & Urim, U. M. (2012)。创业发展与尼日利亚商业生态。非洲小额信贷与企业发展杂志, 卷。 2, 第 2 期, 46-57。尼日利亚埃多州：贝宁。
- Imhonopi, D., Onifade, C. A. & Urim, U. M. (2013)。集体行为和社会运动：概念审查。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杂志, 卷。 3 (9), 53-63。
- Imhonopi, D. & Urim, U. M. (2015)。缩小尼日利亚日益膨胀的青年不稳定阶层：增强青年权能的必要性。非洲研讨会, 卷。 15, 第 1 号, 69-82。
- Imhonopi, D. & Urim, U. M. (2016)。尼日利亚昂贵的民主政治和失业：与中国的比较。在 C. Enwere 和 M. Khalil-Babatunde (Eds) 中, 尼日利亚的比较研究：来自全球南方的教训。尼日利亚阿布贾：尼日利亚土耳其尼罗河大学。
- Kwanashie, M. (2007)。中尼关系：对贸易的影响。尼中关系圆桌会议：拉各斯, 尼日利亚国际事务研究所 (NIIA) 的经济和政治维度, 第 2 页
- 美国的民主真的比中国的独裁好吗? (2015 年)。取自 <https://www.quora.com/Is-American-democracy-really-so-much-better-than-Chinese-dictatorship>
- 江 W. (2009)。“为龙加油：中国的崛起及其在非洲的能源和资源开采”。中国季刊 (199) (09): 585-615。
- Jamo, I. A. (2009)。尼日利亚的民主与发展：问题与挑战。 2010 年全球金融危机与非洲寻求发展国际会议论文集。艾哈迈杜贝洛大学扎里亚行政学院
- Jamo, I. A. (2013)。尼日利亚的民主与发展：有联系吗？阿拉伯商业和管理评论杂志 (阿曼章) 卷。 3, 第 3 期, 85-94。
- Konings, P. (2007)。中国和非洲：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中社会杂志, 23 (3), 341-367。

- Lawal, S. M. (2015)。尼日利亚选举制度中的腐败评估。欧洲科学杂志, 第 11 卷, 第 256 - 273 页。
- 莱昂内尔 R. (1932)。论经济科学的本质和意义的论文。
- 赖 H. H. (2007)。中国的石油外交：它是全球安全威胁吗？第三世界季刊, 28(3), 519-537。
- Lumanyano N. (2018)。尼日利亚的政治经济。可在：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34773448>
- Mlambo C., Kushamba, A. 和 Simawu, M.B. (2016 年)。中非关系：背后是什么？中国经济, 49, 257-276。
- Momoh, Siaka (2009), “尼中关系有多整洁”, http://www.businessdayonline.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
- 莫里森, W. (2014 年)。中国经济崛起：历史、趋势、挑战和对美国的影响。国会研究服务。取自 www.crs.gov
- 恩达-以赛亚, J. (2015)。布哈里：一个没有完整部长职位的内阁。领导报纸。取自 <http://leadership.ng/news/471461/buhari-a-cabinet-without-complete-ministerial-portfolios>
- Ogunsanwo, A. (1974), 中国对非洲的政策, 1958-1971, 伦敦：剑桥大学出版社。
- 奥克, L. (2005 年)。全球化、民主和妇女赋权：尼日利亚的问题和挑战。在 Olufayo, O. (Ed.), 全球化和非洲发展的观点。拉各斯：博拉贝出版物。
- Onuoha, J. (2008), 超越外交：国际关系中的当代问题, Nsukka: Great AP Express Publishers Limited。
- Omolade A. 和 Howard S. (2019)。中国在尼日利亚投资的政治经济学。牛津奖学金在线。第 194 页
- Owoeye, J. (1986), “尼日利亚与中国”, Olusanya, G. O. 和 Akindele, R. A. (eds.) 尼日利亚的对外关系：头二十五年, 伊巴丹：伊巴丹大学出版社
- SAIS-CARI (2018) “数据”<http://www.sais-cari.org/data/>。
- Ogunrnu, O. (2017)。“中国在尼日利亚投资对国家发展的影响”。研究生论文。伊洛林大学和平与战略研究中心, 9-16。
- Ogunsanwo, A. (2018)。中国在非洲的政策, 23-28。伦敦：剑桥大学出版社。
- Oniku, C. 和 Gbadamosi, A. (2009)。“中国与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经济协定的战略意义：以尼日利亚为例”。国际艺术与科学杂志会议 1(18):115-130
- Pigato, M. 和 Tang, W. (2015)。中国和非洲：在不断变化的全球背景下扩大经济联系。投资非洲论坛, 埃塞俄比亚的斯亚贝巴。取自 <http://documents.worldbank.org/curated/en/241321468024314010/China-and-Africa-expanding-economic-ties-in-an-evolving-global-context>
- 皮斯, K. (2010)。“中国在非洲：用基础设施和现代化来治愈资源诅咒”。可持续发展法律和政策。12(3)。35-41、57-60。
- 雷诺, 威廉。(1999)。“弱国的描述性政治逻辑”。在军阀政治和非洲国家, 由 Edbong Moore 编辑 23-28。

- Ramani, S. (2016 年) “中国-尼日利亚关系：北京软实力的成功故事”，外交官，7 月 12 日，<https://thediplomat.com/2016/07/china-nigeria-relations-a-success-story-for-beings-软实力/>。
- 拉莫斯, J. C. (2004)。北京共识。在 Zafar, A. (2007)。中国与撒哈拉以南非洲日益增长的关系：宏观经济、贸易、投资和援助联系。世界银行研究观察员提前访问。
- Sautman, B. 和 Hairong, Y. (2007)。朋友和兴趣：中国与非洲的独特联系。非洲研究评论, 50 (3), 75-114。
- 斯坦因, H (2012)。非洲, 工业政策和出口加工区：亚洲的教训。在 Noman, A. Botchway, K., Stein, H 和 .Stiglitz, J. (Eds.), 非洲的良好增长和治理：重新思考发展战略。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
- 苏伦德拉 P., (2012 年)。中国经济特区的政治经济学及其对劳工的启示。新德里工人教育中心。
- Sun, I. Y., K. Jayaram 和 O. Kassiri (2017 年) “与狮与龙共舞：非洲和中国如何参与以及合作将如何发展？”麦肯锡和公司报告, 6 月, <https://www.mckinsey.com/featured-insights/middle-east-and-africa/the-closest-look-yet-at-chinese-economic-engagement-in-africa>。
- Shiitu A.R. 和 Adenike O. (2018)。中国投资及其对尼日利亚经济安全的影响。巴西非洲研究杂志。3(6), 第 3 页。123-142
- 站立, G. (2012)。不稳定者：为什么需要协商民主。开放民主。取自 <http://www.opendemocracy.net/guy-standing/precariat-why-it-needs-deliberative-democracy>
- 这天。(2010)。我们昂贵的民主。取自 <http://www.thisdaylive.com/articles/our-expensive-democracy/85589/>
- 塔朱丁。J. A (2013)。尼中贸易关系：对尼日利亚国内经济的影响。财务与会计研究杂志。第 4 卷, 第 17 期。
- 泰勒 G. (2004)。中国纺织品贸易。时尚营销与管理杂志, 8 (2), 136-140。
- 经济学家。(2018 年)。在非洲的中国工人和商人。经济学家。取自 <https://www.economist.com/special-report/2018/05/17/chinese-workers-and-traders-in-africa>
- 特罗菲莫夫, Y. (2007)。新管理：在非洲, 中国的扩张开始引起反感；投资热潮助长“殖民主义”指控；赞比亚的悲剧。华尔街日报 (东部版)。
- 贸发会议。(2018 年)。在线统计。取自 <http://unctad.org/en/Pages/Statistics.aspx>
- Utomi, P. (2007)。中国和尼日利亚。7 月 13 日从 <http://csis.org/files/media> 检索
- Umejei, E. (2015 年) “中国与尼日利亚的接触：机会还是机会主义者？”非洲东亚事务：中国监测第 3 期和 12 月 4 日。
- 贸发会议 (2018 年) “在线统计”, <http://unctad.org/en/Pages/Statistics.aspx>。
- Usman, S. (2010 年), 洞察尼日利亚经济状况, 由 Hon 发表演讲。卡诺巴耶罗大学国家计划委员会部长。可从; <http://www.npc.gov.ng/main/ministerspeech>。

- Urim, U. M. & Imhonopi, D. (2013)。民主的尼日利亚化：如何让它发挥作用！”在 D. Imhonopi 和 U. M. Urim (Eds)。一系列社会科学读物：尼日利亚的教训和来自尼日利亚的教训。拉各斯：圣约大学社会学系。
- Udeala, O. (2008)。外交政策和尼日利亚形象项目：限制和挑战。尼日利亚论坛，卷。 29，Nos.11-12：11 月至 12 月，第 72 页。
- Utomi, P. (2009)。中国和尼日利亚
<http://africacenter.org/wpcontent/uploads/2009/10/01/China-and-Nigeria.pdf>。
- 先锋报 (2021 年 2 月 8 日)。尼日利亚是中国在非洲的主要投资目的地。
<https://www.vanguardngr.com/2021/02/nigerias-chinas-major-investment-destination-in-africa/>
- 沃尔德伦, A. (2008 年)。中国在非洲。
- Wu, Y. (2000)，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否可持续？生产力分析，中国经济评论，11(3)，278-296。
- 温平, H. (2007)。中国对非政策的平衡行为。中国安全，第 3 期，第 23-40 页。
- 世界计。(2016 年)。尼日利亚人口(2016 年和历史)。取自
<http://www.worldometers.info/world-population/nigeria-population/>
- 世界银行(2018 年)“国际债务统计：尼日利亚”，
<http://datatopics.worldbank.org/debt/ids/country/NGA>。
- 扎法尔, A. (2007 年)。中国与撒哈拉以南非洲日益增长的关系：宏观经济、贸易、投资和援助联系。世界银行研究观察员，高级访问。
- Zweig, D., & Jianhai, B. (2005)。中国在全球范围内寻找能源。外交事务，84(5)，25-38。
- 郑。 S., Fu, Y., & Liu, H. (2009)。中国对城市生活质量的需求：补偿土地—租金和工资—差价的演变。房地产财经杂志，38(3)，194-213。